

战略经济与 大国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现代译丛



时事出版社

现代译丛

战略经济与大国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时事出版社

战略经济与大国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8.75 字数: 220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009-062-0/Z·06

定价:2.50元

编 者 的 话

我们选编的《现代译丛》已出版了两辑，第一辑为《当代世界与中国》，第二辑为《中国改革与世界前景》，均受到读者欢迎。

本辑为《战略经济与大国关系》，辟有《世界看中国》、《经济展望》、《亚太经济与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等栏。所选载的文章大都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当前大国间关系和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趋势，评估了中国经济改革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并用战略经济学阐述了美苏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文章的作者多半系有关领域的权威和专家。他们的分析有事实有理论，对读者依据经济发展观察大国关系会有参考价值。

目 录

· 世界看中国 ·

- 中国崭新而有实效的新发展战略……………〔日〕渡边利夫(1)
-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将增大……………〔西德〕奥皮茨(8)
- 东北亚的大国关系……………〔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14)
- 中、美、日三角关系……………〔美〕哈里·哈丁(23)
- 中国登上军备控制舞台……………〔美〕阿拉斯泰尔·约翰斯顿(36)
- 观察中国……………〔美〕费正清(44)

· 经济展望 ·

世界经济与工业技术发展

- 引起的变革……………〔美〕迈克尔·布卢门撒尔(58)
- 美元猛跌之后：世界大翻个……………〔美〕约翰·D·保罗斯(82)
- 西太平洋经济圈与今后日中系关……………〔日〕小林实(93)

· 亚太经济与政治 ·

泰国的工业化向新兴

- 工农业国迈进……………〔日〕亚洲经济研究所(111)
- 即将跨入1990年的
- 印度尼西亚……………〔美〕加斯頓·J·西古尔(138)
- 菲律宾的新人民军……………〔美〕威廉·查普曼(146)
-

• 美洲国家关系 •

里根执政期间的美国和拉美关系:

- 分歧与局部调整……………〔墨〕埃拉尔多·穆尼奥斯(161)
美国为何要搞掉巴拿马的诺列加……………〔美〕詹姆斯·蔡斯(177)
-

• 美国对外政策分析 •

- 美国力量的限度:从尼克松到里根……………〔美〕菲尔·威廉(192)
一位共和党人看美国外交
政策……………〔美〕理查德·G·卢格尔(204)
美国外交:一个民主党人的观点……………〔美〕阿瑟·施莱辛格(212)
-

• 国际关系理论 •

- 谈战略经济学……………〔美〕诺曼·贝利、卡恩斯·洛德(226)
超级大国在衰落吗?
——经济情况与国家安全
……………〔美〕理查德·科恩、彼得·A·威尔逊(233)
-

中国崭新而有实效的新发展战略

〔日〕渡边利夫

原文提要：由于引进了“市场”机制，中国农村出现了活力，乡镇企业吸收了剩余劳动力；

但乡镇企业如不具备资本装备和基础设施，就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只有推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才是克服矛盾的途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在这一年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直被顽固坚持下来的中央集权式社会主义体制，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开始“熔解”。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国经济，也遽然进入活跃阶段。回溯过去，中国的体制改革已有了10个年头。

但经过10年的体制改革，现在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迄未有过的深刻“矛盾”，而且已经到了必须解决这一矛盾并开拓一条新的生路的时刻。今年1月，赵紫阳总书记作为表明领导人的意见而发表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指出了克服中国经济新矛盾的方向，极其耐人寻味。在长达10年的体制改革过程中所产

本文译自日本《东洋经济》周刊1988年7月16日；作者为东京工业大学教授。

生的新矛盾是什么？有无克服的可能性？本文将对此发表以下看法。

可吸收剩余货币和剩余劳动力的乡镇企业

1978年以来的中国体制改革，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中引进市场机制，最初是试验性的，接着便是正式的引进，以这种方法使社会主义统制经济体制逐渐“熔解”。所采取的方式是：在“统购统销”制度下的集体主义农业经营中引进“家庭生产责任制”，并进一步改变为“家庭经营责任制”，以此恢复个体农民经营制，并逐渐消灭人民公社制度。

另一种方式是，“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体制中，逐步引进以保留利润为中心的企业自主权，并使这种方式转变为新的自主经营单位。这种尝试，既搞活了农民和企业等一些经济主体，又不得不完善商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从而使流通市场、劳动市场、金融市场日益活跃，逐渐出现了自由化。

总而言之，迄今的中国体制改革，是在过去牢固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引进市场机制，从而使中央集权体制逐渐熔解。换言之，它并非一开始就有一个成形的开发战略设想。但过去一直被禁锢在僵硬的中央集权体制中的中国公民和企业，由于引进了市场机制，其能量一举迸发出来，而在经济上表现出来的活跃劲头，甚至会经常产生“过热”现象。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农村的活跃局面。三中全会的农业政策，在使人民公社解体的同时，也使农民的个体经营体制在整个中国恢复起来。加之，政府实施了提高收购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激发了农民增产的干劲，迅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的收入水平。

情况不仅如此。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方面为农户创造了剩余货币，另一方面因缓和了农民从事非农业工作的限制，劳动

力过剩现象也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三中全会农业政策的指引下产生的大量剩余货币和剩余劳动力，纷纷向“乡镇企业”寻求出路，促使乡镇企业爆炸式地扩大起来。

乡镇企业对长期苦于轻工业品供给不足而又价格昂贵的中国农村来说，是一种既能摆脱人民公社制度束缚，又可自由产销产品为主体而形成的新型企业形态。而且其生产效率和收益要比从事农业生产高出几倍。因此，农民将其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连续不断地大量投入乡镇企业。

实际上，自1978年到1986年期间，在农村从农业转向以乡镇企业为中心的非农业部门的投资额为1800亿元。同一时期，乡镇企业吸收了农业人口劳动力7900万人。即使从中减去1978年以前即在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就业的劳动力2200万人，在这8年内新产生的非农业就业人口依然有5700万人。这实际上相当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自1952年到1986年30多年中所吸收劳动力总数的70%。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划时代的创举。

乡镇企业尽管诞生时间不长，但现在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已是举足轻重的。而在这样短的期间里，乡镇企业的产值在全国农工总产值中所占比率也在迅速地上升，1986年已达23.4%。而到1985年，其产值已超过农业（种植业）产值。

乡镇企业的核心是工业部门，该部门1986年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比率为68.2%。而现在乡镇企业的出口额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6%。

需要巨额积累资金的两个课题

能否成功地使乡镇企业扩大，并由它吸收剩余劳动力，这是能否使农工两个部门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新循环机制的最重要因素。

在中国体制改革中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经济主体，即是乡镇

企业。乡镇企业的潜力依然很大，今后还可能不断地发展、扩大。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资本装备量无疑会发展得更加庞大。

但另一方面，正如人们所广泛议论的，随着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经济的日益活跃，在资本密集型基础产业与能源、运输部门等之间发生了极为深刻的矛盾。如不解决这个问题，就难以指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此外，1978年召开三中全会之后，国家依靠人民公社制度，从农民手中强行征收农业剩余价值而转投到重工业基础设施部门的传统的高积累模式，也已彻底崩溃。因而，除掉外国资本后的国内收入积累率已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总而言之，在积累率大大下降的现状下，一是必须促进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进一步扩大乡镇企业的资本装备；二是需要积极改善资本密集型基础产业与能源、运输部门的关系。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同时解决上述两项均需庞大积累资金的课题的时刻。

如前所述，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全靠在原有体制中引进市场机制，从而挖掘出农民和企业的增产欲望。而旧的开发战略则并未要求做到这一点。但可以说，已经搞活了的中国经济，在其成功之前，势必同时面临必须解决资源枯竭及以巨额资金去开发资源的两个极为困难的课题的局面，即已经到了必须制定开发资源及合理分配所开发资源的综合开发战略的时刻。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建发表的《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载于《经济日报》1988年1月5日）的论文中所提出的开发设想，正在中国逐渐获得强有力的支持。该论文虽在战略的细节问题上尚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但它是第一个正视目前中国经济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并指出新方向的开发战略，应给予高度评价。

旨在克服矛盾的划时代的文献

王建的论文认识到，一是农村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二是国家基本建设的扩充，在这两个都必须促进的项目之间对国内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应该说，这种认识确实是正确的。作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办法，王建最后提出的选择是：“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之中，即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同时在国际市场中赚取外汇。外汇代表所有的资源供给。只要有外汇，就能得到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疏通农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就能创造解决矛盾所必须的矛盾转化的条件。”

也就是说，他所提出的办法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型工业，一可通过这种工业的强大雇用吸引力，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二可将出口所获外汇资源投入重工业部门，以便促进重工业的发展。根据王建的说明，中国如欲解决农村剩余人口问题，在本世纪末之前，需从农村转移出1.8亿人口。而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额如能达到1500亿美元，即可吸收其中的6000万人。另外，对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就业的增加人数即使保守地假设为1比2，再加上前述6000万人，亦可望增加1.2亿的就业人口。其结果，到2000年，中国即可大致解决农业劳动力的吸收问题。

问题是，到本世纪末能否完成1500亿美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问题，这需要年增长率达到12%。这一数字，比新兴工业经济群（NIES）迄今所实现的增长率低得多，对中国来说，是很有可能达到的。

可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的成功相媲美的战略

尽管这一战略尚未成熟，但其所指基本方向，确可称之为崭新的具有实效性的一种探索。理由之一，它是以开发资源受到严格的制约为前提，并考虑到动员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又要扩大另一个基本条件的国家建设，展示出要或多或少地同时解决上述两个课题的开发前景。

我认为，这一战略之所以具有实效性，不外乎它与南朝鲜、台湾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在开发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极为相似。南朝鲜和台湾工业化的杰出特点之一是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吸收雇工的力量极强。而具有这样强大的雇用吸引力，不外乎来自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中心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

由于工业化具有强大的雇工吸收力，南朝鲜和台湾农村的过剩就业状态很快就被消除，对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加之，以最终消费资料为中心而展开的南朝鲜和台湾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在其后续阶段，创造了“后方关联效应”，即诱发了以最终消费资料生产为目的的所需投入资料（零部件、中间性产品、机械设备等）的国内生产，并趁这一效应，迅速实现了两国的重化学工业化。

可以说，王建设想的中国经济发展体制的有效性，已由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开发战略的成功得到可靠的证实。

中国新战略之所以能得到好评的第二个原因，即因为它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而且它又是依靠引进外国资本的工业化战略，与当前中国周边各国所急速开展的结构调整，以及在西太平洋地区新产生的贸易、投资环境非常适应。

日本由于日元的过度升值，正在成为庞大的进口国。而且日本企业正逐步地将其生产据点向西太平洋发展中国家转移。南朝鲜和台湾等正在逐步丧失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越性，近几年在

日益明显地将其生产据点向后进国家转移。可以说，中国欲在沿海地区培育出口导向型企业，其贸易和投资环境是空前优越的。

可以认为，中国新战略的出场是合乎时宜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实践中将此战略具体化。

（袁蕴华 译，于国娴 校）

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将增大

〔西德〕奥皮茨

在美、日、苏、中四个大国中，“太平洋大国”的概念很长时期只是指美国和日本。中苏则宁可说是地理上的大国。起初它们对太平洋无甚雄心，所以长期以来都未拥有一个大国地位所必需的海上力量和有关的基础设施。

当然，中苏之间也还是有区别的：对俄国来说，随着它在远东地区所占的重要性日益增大，它开始认识到在西太平洋发展自己力量的必要性——但最初也只是为了建立对日本的均势以及保障黑海港口与远东港口之间的海上联系。直到70年代初，它才开始有决定性的突进。但那时基本上还只是军事潜力使苏联成为一个太平洋大国，它在太平洋地区（除了西北部之外）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当然，戈尔巴乔夫最近的倡议清楚表明：这种情况将不会再继续下去了。

在太平洋地区四个大国中，中国无疑居于末位。这样说自有其道理：其一，20世纪以前，中华帝国除了发动几次重大的远征外，一直无意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其二，20世纪后，中国历届政府都忙于清除外患，它们不得不将短缺的资源用于重建家园和国家的现代化上；最后，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大多数美国的太平洋盟国或者出于自身利益，或者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也加入了这个封锁行列。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局限于同屈指可数的几个伙伴打交道。

70年代初，随着美中接近，美国取消了对中国的封锁，北京这才得以与大多数太平洋地区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迅速建立外交关

本文摘译自西德1988年第1期《外交政策》季刊；作者为慕尼黑大学教授。

系，并利用这种对外接触扩大与太平洋沿岸国家的经济联系，这时，它才渐渐重视太平洋地区。70年代和80年代初，太平洋对北京来说关系尤为重大，因为，不但美日，而且苏联都在这一地区加强了活动，它必须对此作出反应。

70年代初中国领导首先提出两个目标：

（一）在自己的前沿地带附近和周边地区遏制或者至少抵消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

（二）支持这个地区的小国为追求独立自主、摆脱大国控制所作的努力，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并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它们的关系。

今天，中国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未变，但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在战略和战术方面则有了很大的变化，即由毛构思设计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变为“独立自主”的战略。当然，这一变化基本上是针对两个超级大国而言的。

遏制超级大国

70年代，北京领导人对美苏的战略估计是：在此期间，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已变得更为危险。因此，北京也集中力量广泛地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甚至把美国也包括在内，以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大影响，并且特别要在战略上保护受到危害的国家，如日本。

北京的这一估计当时是符合实际的，因为美国由于在印支的失败而处于守势，而苏联则在中苏边境摆下50万大军和在亚太建立了太平洋舰队，而且未隔多久，又在印度支那获得可观的地区战略利益。在中国和越南关系急剧恶化之际，苏联和越南则于1975年11月缔结了附有军事援助条款的苏越友好条约。

形势对中国更为不利的是：自从1978年以来，越南不仅把其

势力范围扩大到老挝，而且于1978年12月在苏联的庇护下挥戈东进，一举赶走了得到北京支持的波尔布特政权，代之以亲越的韩桑林政府。这一事态发展使苏联有可能在中国南部边境部署军事力量，从而迫使北京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

1979年2月，在通过对越“惩罚性出击”的军事手段也没有能改变这一形势之后，中国只剩下两种最重要的战略选择：要末与华盛顿和东京加强战略合作，要末采取对莫斯科接近的政策。中国领导最终作出了第二种选择。它这样作，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首先，可使中国对美国有更大的活动余地；其次，可使苏联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事实证明，莫斯科不仅允许乌兰巴托跟北京改善关系，而且还从蒙古撤回一部分军队。即便在中国认为是主要障碍的柬埔寨问题上，苏联外长也特别强调苏联对政治解决感兴趣，并且暗示赞成组成一个各党派联合政府。中国的这一选择，使中国大大改善了它在战略大三角中的地位。

当前美苏对西北太平洋和西太平洋仍具有军事和政治上的控制力，中国尚无望上升到与之平等的地位。但是，与20年前相比，那就不能不看到，中国的处境已大大改善了。目前不但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几乎消除，而且两大国都显然在力争与北京合作，并作出了一系列让步。这在过去，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是无法做到的。

可以预料，在不久将来，如果中国现代化继续取得成功，这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潜力产生积极效果，而且将使其政治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东南亚，深入太平洋地区。

尽管美国从长远来看，不得不怀着复杂的心情对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但如果进行阻挠则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非力所能及。因为：（1）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将被日本和西欧国家抢走；（2）美国如破坏中国四化进程，肯定会危及它与北京的良好关系，从而失去一个抗衡苏联的力量；（3）经济上软弱的中

国几乎不能阻挡苏联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只有中国强大起来，才能减轻美国的军事负担；（4）如果改革政策失败，亲西方的改革者就会被削弱，而对亲苏的保守派有利。所以美国将竭尽全力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助中国加强国防潜力。

同时，苏联也只有继续在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许可范围内发展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因为，重新和中国对抗将再一次产生苏联在70年代试图消除的这样一些消极影响：（1）将迫使北京在战略上和军事上更依赖华盛顿和东京；（2）使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反对者团结更紧密；（3）将增加苏联的国防预算，从而大大妨碍苏联的经济改革。

中国已大大提高了对亚太地区施加影响的能力

由于与美苏关系得到改善，中国利用缓和与正常化的新形势，与几乎所有太平洋国家建立并发展了关系，这样，北京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了。

首先是东南亚。印度支那战争后，随着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的削弱，中国立即采取行动，改善与东盟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使之成为抗衡苏联和越南在这一地区不断增加影响的一支力量。为此，（1）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对那些国家共产党在外交上和物质上的支持；（2）加强和泰国的军事合作；（3）保障反越国家的安全；（4）鼓励东南亚国家在东盟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合作。

中国这一转变，不足为奇，因为一个经济上稳定、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联盟可以防止两个超级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过于强大。此外，事实证明，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不但促进了柬埔寨国内抵抗力量的发展，巩固了民主柬埔寨的合法地位，而且有鉴于发动反河内扩张的斗争。倘若反越阵线没有东盟集团参加，北京几乎不